

“西方前哨国家”澳大利亚的 国家安全研究

师小芹

内容提要 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与其立国时间较短、在国际政治中属于中等国家行列,以及“孤悬在亚洲的西方前哨国家”的身份认知密切相关。这一自我认知设定了澳大利亚安全研究的基本框架。受此认知框架制约,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始终围绕三个主题即“澳大利亚是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否应提供与大国不一样的安全议程展开。地理上的独特性和中等国家体量,导致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相比其他国家更重视环境安全、人的安全,以及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和界定国家安全等。

关键词 国家安全研究 澳大利亚 安全主题 人的安全 女权主义 同盟

一个国家如何思考自己的安全和威胁,在思考和研究时又采用了何种视角,最后采取了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和政策,是理解一个国家的安全认知及其安全战略和行为的出发点。当人们谈论“某某国家的国家安全研究”时,作为研

* 师小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邮编:310012)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20VHQ0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教授对本文写作的帮助,感谢《国际政治研究》评审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研究对象的“国家”通常应包括其政界和学界。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研究”则既包括最后成形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包括国家安全研究界的思想辩论,以及政学两界认识安全问题的视角和路径。本文拟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主题、国家安全研究的视角,以及澳大利亚主要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情况进行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概括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特点。

一、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传统主题

澳大利亚立国较晚,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她于1900年获得自治领地位。1926年,伦敦帝国议会通过《贝尔福宣言》,确认英国与其自治领之间的关系是“英帝国内各自独立的主体、地位平等,在内外事务上不彼此臣属”。实际上,怯于失去母国的保护,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澳大利亚继续积极派军赴欧洲参战,并自称“第二帝国军队”,^①仍视自己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②直至1942年12月9日,澳大利亚才通过《威斯敏斯特法采纳法案》,正式成为独立主权国家。^③现代澳大利亚国防军(ADF)则直到1947年才正式成立。

1942年2月15日,英国的新加坡殖民地失陷。英国陷于欧洲战场自顾不暇,远在亚洲的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第一次直面来自日本的进攻,感到孤立无援,遂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澳大利亚与另外一个新生国家新西兰缔结条约,决定在国际事务中携手合作。这是双方独立签署的第一份条约。1946年,澳大利亚曾经寻求在英联邦内组织一个区域防御集团,但没有取得成果。随着美国调整其太平洋战略设想,澳大利亚于1951年与美国和新西兰缔结《澳新美安全条约》(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ANZUS Treaty),正式成为美国盟友。此后,保持与美国的“伙伴关系”(Mateship)成为澳大利亚外交中的首要原则。

澳大利亚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诞生于战火之中。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孤立无援的安全处境,并且远居西方世界的末梢,弱小无助的心情油然而生,寻求强大国家的保护就成为势所必然。这个过程决定着澳大利亚时刻关注它的地理位置和能否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保护。孜孜不倦地探索“我是谁”的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赴欧洲战场的军队称“第一帝国军队”。

② 第一帝国军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协防母国英国的军队。

③ Australia Nationhood Foundation, “Australia-Continent for a Nation: The Beginning,” https://www.nationhood.org.au/australia_continent_for_a_nation, 2023-05-03.

问题,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安全研究的起点,并衍生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三大传统主题。

(一) 国家身份与国家安全

1978年,原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在其出版的著作中认为,1901—1960年代中期的澳大利亚战略文化特征是“它的亚洲地理位置与其欧洲历史”间的冲突。该书指出,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属于亚洲,而在文化上属于欧洲,这一特性决定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困境。^①“我是谁”的问题,也决定了“我的安全是什么”的答案。1975年,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澳大利亚与亚洲:安全视角》一文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布尔对1949—1972年间澳大利亚在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执政期间的安全政策与安全认知的关系进行分析。他指出,澳大利亚对“威胁源自北边/亚洲”的认知塑造了澳大利亚的世界观。由于毗邻一个人口数量对澳大利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亚洲,澳大利亚心生恐惧:它以2682万人口^②占据了面积比欧洲还大的广阔的大洲、坐拥巨量丰富的资源能源、过着比邻居富裕得多的生活——澳大利亚202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6590美元,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4位;^③更何况澳大利亚在文化和社会上与亚洲相比又是如此异质、并对它了解甚少。这种极为悬殊的情况能否永久持续下去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块心病。澳大利亚因此而生活在一种时刻都担心被亚洲抢夺的心态之中。^④直到1991年,澳大利亚战略家阿兰·杜邦(Alan Dupont)仍提出疑问:澳大利亚的地理处境如此有利,它高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究竟源自何处?杜邦的答案是澳大利亚远处大英帝国末端,一直对于母国怀有深切的情感,这使它对于置身其中的广大亚太社区缺少认同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担心自己地广人稀,容易成为与英国为敌的国家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和中国的觊觎对象,这造就了澳大利亚的“被包围”的心态。^⑤

① Thomas. B. Millar, *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 External Relations since 1788*, 2nd ed., Maxwell Macmillan, 1991, p. 374.

② 澳大利亚人口数据见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2024年3月发布的数据。Population,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people/population,2024-04-01>.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发布的2023国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报告,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PC@WEO/OEMDC/ADVEC/AUS,2024-04-01>。

④ Hedley Bull, “Australia and Asia: Security Perspectives,”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Vol.4, No.2, 1977, pp. 135-148.

⑤ Alan Dupont, *Australia's Threat Perceptions: A Search for Security*, ANU Press, 1991.

由此,当澳大利亚在检视其安全环境时,第一步始终是追问自己到底是不是亚洲国家。前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校长理查德·海格特(Richard Higgott)和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金·理查德·诺萨尔(Kim Richard Nossal)于1997年指出,很少有国家像澳大利亚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样持续地、自觉地寻求“再定位”。1983—1996年期间,工党政府持续推动澳大利亚“入亚”。但之后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又“摆回”美国身边。两位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位于交接处的尴尬的地理位置/别扭的身份”(liminality)难以改变,只能对其进行管理,应该通过积极外交来平衡这种地理位置带来的限制。^①

概括来看,澳大利亚对“亚洲”的定义因循地区财富与权力格局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随着澳大利亚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系变得紧密,1997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甚至提出“东亚半球”(East-Asian Semisphere)的说法。2001年,“9·11”事件后,澳新美同盟被激活。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了中东/西亚两场战争。印度经济崛起与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及中国崛起,又使澳大利亚学界放宽视野,逐渐青睐“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后被澳大利亚和美国政界所采用。^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令人不知所措的“亚洲性”问题上,澳大利亚通过“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太平洋”这样的新的地理概念来稀释它。2003年,澳大利亚外交和军事史家彼得·爱德华兹(Peter Edwards)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荣誉教授大卫·戈兹沃西(David Goldsworthy)所主编的《面向北方:澳大利亚与亚洲的世纪交往》一书提出,澳大利亚无需认为自己是亚洲国家,而是可以将自身界定为“亚洲—太平洋”国家。如此一来,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次区域,澳大利亚应该致力于亚太稳定。对东亚来说,它是安全的南方;对南太平洋国家来说,它是安全的西方;通过《澳新美同盟》,澳大利亚又可以变成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粘合剂。^③ 同样,“亚洲—太平洋”概念的其中一个使命是不变成一个“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用此概念拉近自己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与亚洲

^① Richard A. Higgott and Kim Richard Nossa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minality: Relocat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 No.2. 2010. pp. 169-185.

^② Michael Wesley, “Australian Thinking About Asia,” in Daniel Marston and Tamara Leahy, eds., *War, Strateg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Robert O'Neill*, ANU Press, 2016, pp. 285-300.

^③ Peter Edwards, “Conclusion,” in Peter Edwards and David Goldsworthy, eds., *Facing North: A Century of Australian Engagement with Asia*, Vol.2, 1970s to 2000,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25-330.

的距离,而无需先变成一个亚洲国家。由此可以在分享亚洲繁荣发展的同时确保安全。^①

2005年,澳大利亚国防学院讲席教授迈克尔·伊文斯(Michael Evens)认为,澳大利亚的“位于交接处的尴尬的地理位置”这种国家身份导致其安全理论与战略实践失调。伊文斯认为,澳大利亚的安全战略没有基于其地理特性,而是基于地缘政治处境,从而造成澳大利亚在安全观念上首先想要捍卫的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社会这一身份,而不是着眼于保护国家领土的安全。澳大利亚认为自己是一个岛屿国家而不是一个大陆国家,这造成它在国防战略上经常在“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ce)还是“大陆防御”(continental defence)之间踌躇。澳大利亚始终不能规避的是运用其有限的人力和经济资源来保护本土还是向海外投送力量以帮助(美国)维护全球战略均衡这一张力。^②

大约从2012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与学界开始提出“印太”概念,建立“印太”框架,并最终以太平洋为中心规划新的战略。^③“一个国家改变其首要战略环境的地理界定并不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但这正是澳大利亚近年来所做的,它拥抱了‘印度洋—太平洋’概念。”随着美国于2018年将原太平洋战区扩大为“印度洋—太平洋”战区,并开始使用“印太”概念来重构其全球安全态势,^④澳大利亚与美国保持一致也正式将“印太”作为核心概念之一使用。2019年,曾经担任过驻印大使、外交通商部常务副部长的昆士兰大学校董会主席彼得·瓦格斯(Peter Varghese)在演讲中评价澳大利亚的这一特性。他认为,“印度洋—太平洋”概念是对澳大利亚所处战略环境的一种“想象中的与承认上的结构性转型”。^⑤ 澳大

① David Brewster, “Australia’s View of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India Foundation, January 5, 2021, <https://indiafoundation.in/articles-and-commentaries/australias-view-of-the-indo-pacific-concept/>, 2023-11-30.

② Michael Evens, “The Tyranny of Dissonance Australia’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 of War, 1901-2005,” Australian Land Warfare Studies Centre, Study Paper No.306, 2005, https://researchcentre.army.gov.au/sites/default/files/sp306_tyranny_of_dissonance-michael_evans.pdf, 2023-11-27.

③ David Scott, “Australia’s Embrace of the ‘Indo-Pacific’: New Term, New Region, New Strate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3, No.3, 2013, pp. 425-448.

④ Jim Garamone, Pacific Command Change Highlights Growing Importance of Indian Ocean Area, DoD News, May 30,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1535808/pacific-command-change-highlights-growing-importance-of-indian-ocean-area/>, 2024-04-01.

⑤ Peter Varghese, “The Indo Pacific and Its Strategic Challenges: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Speech by Mr. Peter Varghese AO,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to the 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8 January, 2019, <https://www.uq.edu.au/about/chancellor/speeches-and-articles/indo-pacific-and-its-strategic-challenges-australian-perspective>, 2023-11-30.

利亚的安全战略转型再次以对自己的地理位置再定义开始。^①

尽管澳大利亚的战略研究是盎格鲁-撒克逊战略研究传统的一部分,但在澳大利亚特色环境中形成的一个独特变体。^②这一变体的澳大利亚特色是其格外突出的“亚洲”主题。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l)也经由战争而“进入亚洲”或者说亚洲研究。他关于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和亚洲战略格局变迁动力的研究为越战后澳大利亚的战略思考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核战略研究和反叛乱作战研究,也是以亚洲作为背景来进行的。^③

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入亚还是不入亚、是亚洲—太平洋国家还是印度洋—太平洋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极大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认知。这些认知仍然在变动之中,它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影响仍在持续。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正在进行一项名为“1901年以来的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概念史”的研究,该项目议题涉及国家安全概念在澳大利亚的演变,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形式等。^④

(二) 以同盟问题为中心的安全研究

澳大利亚在研究国际安全时,首先考虑的是它的盟友关系,其次才是战争行为本身。^⑤澳大利亚国内战略辩论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同盟、自我依赖(Self-reliance)^⑥与同盟内的自我依赖(self-reliance within the alliance)”之间的界线。

^① Graeme Dobell, “Australia’s Indo-Pacific Understanding,” ASPI, Aug. 17, 2015,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ustralias-indo-pacific-understanding/>, 2023-11-30.

^② Catherine McArdle Kelleher, “The Postwar Evolution of the Field of Strategic Studies: Robert O’Neill in Context,” in Daniel Marston and Tamara Leahy, eds., *War, Strateg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Robert O’Neill*, ANU Press, 2016, pp. 91-105.

^③ Michael Wesley, “Australian Thinking About Asia,” in *War, Strateg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Robert O’Neill*, 2016, pp. 285-300.

^④ ARC Discovery Projects 2021,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Australian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1901,” Deakin University, <https://research-data.deakin.edu.au/mint/print/detail/05fea72b733d4129852986da8c13e29e/>, 2023-06-07.

^⑤ Thomas Richardson, “The Korean War,” in Peter Dean and Tristan Moss, eds., *Fighting Australia’s Cold War: The Nexus of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a Multipolar Asia, 1945-1965*,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75-92.

^⑥ 本文将“Self-reliance”翻译成“自我依赖”,而非一般读者所更熟悉的“自力更生”,是考虑到“自力更生”在中文语境中有其历史渊源,它与反对霸权,反对外国控制,反对结盟有强劲的联系;它有一种“做出来给你看”的对立的劲头在里面。而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最多是用此词汇表达澳大利亚应该加强自身实力,不能百分百依赖盟友的意思。“自我依赖”在情绪上也更温和,不认为结盟和与盟友合作,包括在本土部署盟友部队是民族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放弃结盟,完全靠自己不是澳大利亚的意图。

1976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首次引入“自我依赖”概念,并称“自我依赖”是澳大利亚国防的首要要求。当时的背景是澳大利亚看到国际安全环境正在巨变。英国自苏伊士运河之东撤退,美国在尼克松提出“关岛主义”之后削减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介入,要求美国的朋友在除非出现重大进攻的情况下有能力保卫自己。而且美国的利益和使命是如此之多,澳大利亚不一定是美国的要务。因而,澳大利亚有必要具备一定的自保能力。最初澳大利亚谈论的“自我依赖”主要指具备一定的自主国防工业实力。^① 1987年、1994年和2000年的国防白皮书都把“自我依赖”作为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首要事务。“自我依赖”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力量结构、联合作战行动和国防工业都产生了影响。^②

之所以会出现“自我依赖”概念,这与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历史有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保罗·狄普(Paul Dipp)对“自我依赖”做了观念史研究。他指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始终有一种坚固的认识,即澳大利亚是一个脆弱的国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殖民地早期,联合起来免受威胁、保障安全就是一个急切的愿望。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Australian Commonwealth)成立后,围绕如何保卫联邦,出现两派关于国防政策的分支思想,一派为“澳大利亚主义者”(Australianists),另一派为“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后来演变成“堡垒澳大利亚”(fortress Australia)与“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ce)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入侵威胁使澳大利亚深切感受到没有强大盟友保护的危险,造就战后澳大利亚采取“前沿防御”战略,即派出远征部队,与盟国并肩在全球征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以后,澳大利亚转向自我依赖的“保卫澳大利亚”(defence of Australia)。1976年的《国防白皮书》中使用的“自我依赖”指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对外战略第一次从“前沿防御”转向准备独立的、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保卫澳大利亚”大陆。“自我依赖”概念是澳大利亚对澳美同盟有限性的承认。

“自我依赖”概念招致了很多批评。1996年,罗宾·利姆(Robyn Lim)和麦克伦南(A. D. McLennan)撰文指出,1983—1996执政期间,在面临消极地

^① *Australian Defence (1976 Defence White Paper)*,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rp/rp1516/DefendAust/1976, 2024-04-01.

^② S. Fruehling, “Australian Defense Policy and the Concept of Self-re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8, No.5, 2014, pp. 531-547.

专注于大陆防御或积极地维持亚洲的势力均衡选择方面,工党政府采取了一条有意识的战略模糊道路,即所谓的“同盟框架内的自我依赖”。澳大利亚相信,通过这样的道路,一方面可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可以在亚洲地区赢得更多尊重,而且仍然维持对美同盟。^① 2013年,澳大利亚已故退役少将、参议员吉姆·莫兰(Jim Molan)撰文批评说,“自我依赖”听起来很聪明,但实行起来不知所云,“自我依赖”可能在概念上有些许意义,但在实际的国防政策中会变成对“搭美国便车”的一种掩护性说辞。他认为,虽然“自我依赖”始终是有限度的,比如在美国核保护伞下从海外购买最好的装备,但如果一定要“自我依赖”,至少澳大利亚要能在本土进行装备维护,即拥有有效的国防工业。“自我依赖”使澳大利亚的作战行动变成“受美国领导、受美国支持,但是美国给澳大利亚赋能”。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而不是“自我依赖”。^②

1987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宣称“澳大利亚的自我依赖概念必须坚定地置身于同盟框架和地区联合之内”。“自我依赖”指的是不能完全指望盟友保护自己而自己却无所作为。不是把责任的重负交给盟友,也不是完全不要盟友,一切靠自己。西澳大利亚大学国防与安全研究所创始所长,现任职于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彼得·迪恩(Peter Dean)在2020年指出,“自我依赖”是有限度的。“自我依赖”不是“自给自足”,也不是单独行动;在情报、后勤、装备和其他领域,澳大利亚仍然是依赖盟友的。^③

同盟中的对等忠诚也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许多人认为同盟内的对等忠诚是不言而喻的。澳大利亚虽然时常不愿被认为它对美国处于屈从地位,但仍然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参与的所有战争。澳大利亚以此确保它是美国可靠盟友的信誉,并希望在关键时刻得到美国的同等忠诚回报。但是,澳大利亚也有失望的时刻。比如,在1999年东帝汶危机期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拒绝了澳大利亚提出的美国“至少派一艘舰或一架飞机”的请求,也拒绝派遣地面部队,只愿意提供一些后勤支持。这被澳

^① Robyn Lim and A. D. McLennan, “Self-Reliance as Panacea: Muddling Strategic Thinking in Australia,” *Agenda: A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Reform*, Vol.3, No.3, 1996, pp. 267-275.

^② Major Gen and Jim Molan, “Defence Policy: Self-reliant or Self-deluded?” *The Interpreter*, Lowy Institute, June 14, 201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efence-policy-self-reliant-or-self-deluded>, 2023-11-23.

^③ Peter Dean, “A New Strategic Song? ANZUS, The 2020 Australian Defence Update, And Redefining Self-Reliance”, *War on the Rocks*, Aug. 12,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8/singing-a-new-strategic-song-anzus-the-2020-australian-defence-update-and-redefining-self-reliance/>, 2023-12-02.

大利亚视为美国“对过去(澳大利亚的)忠诚和支持的不良回报”。^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伊恩·亨利(Iain Henry)辩解说,尽管美国回报的忠诚不是对等的,但好过不回报。澳大利亚仍然维持了它对盟友的忠诚,只是对其向美国表达忠诚的方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②

澳大利亚“自我依赖”概念和对同盟忠诚问题的态度受制于同盟盟约。在1951年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缔结的《美澳新同盟条约》(ANZUS)中,其界定同盟义务的核心条款第四条是如此陈述的:“各方认识到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任何对其中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威胁到各自的和平与安全,各方宣布它将按照本国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在1997年澳大利亚发布的《战略政策》文件中,澳大利亚是如此解读美国的同盟义务的:“危机时期,双方互助,如ANZUS第四条所言‘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危险’。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保证。事实上,该条约明确要求各方量力而行。它也不等于危机时期派兵的承诺。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使我们可以基于对实质性的、至关重要的来自美国的非作战性支持(non-combat support)^③的期望制订计划。”“我们并不假定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因为这样的期望与我们自我依赖(self-reliant)的态势和我们的联盟义务不一致。”^④2000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重申,澳大利亚不是依赖美国,而是与美国互助,除了一个例外,即澳大利亚依赖美国提供的“延伸核威慑”来应对针对澳大利亚的可能性很低的核攻击。^⑤

同盟的安全困境也是澳大利亚关注的重点。被誉为澳大利亚两大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另一位是“英国学派”的赫德利·布尔)的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员克萝尔·贝尔(Coral Bell)在其1984年出版的专著中就深入探讨了澳大利亚作为同盟中的弱势一方,如何校准它与超级大国美国的盟

① Iain D. Henry, “Adapt or Atrophy? The Australia-U. S. Alliance in an Age of Power Transi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26, No.2, 2020, pp. 1-18.

② Ibid.

③ 在现代军事术语中,军事行动可分为战争军事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相应地,由国防部门提供的支持也分为作战性支持与非作战性支持。如此划分的原因是军队遂行的行动在烈度和政治目标上有比过去更加细致的分类。

④ “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 Department of Defence, 1997, <http://repository.jeffmalone.org/files/defence/SR97.pdf>, 2022-04-12.

⑤ “Defence 2000,”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36, <https://defence.gov.au/publications/wpa-per2000.PDF>, 2022-04-12.

友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安全行为体。^① 贝尔揭示了“同盟的安全困境”,即同盟中内嵌的羁绊与抛弃的张力。^② 2001年“9·11”事件后,克萝尔·贝尔在为澳大利亚战略与政策研究所(ASPI)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对新型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反应将削减美国容许其他国家“搭便车”的意愿。美国权势消散,多极世界出现,澳美同盟的形式可能出现变化。^③ 2005年,保罗·狄普曾指出,澳大利亚“自我依赖”的防御态势对澳美双方安全都做出了贡献。尽管澳美同盟增强了澳大利亚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在亚洲中的地位,但美国不能把澳大利亚的友谊视作理所应当。如果美国对澳大利亚提出一些难题,如在反恐方面给澳大利亚带来难以接受的风险,或者把澳大利亚拖拽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大规模冲突之中,澳美同盟的良好关系就可能面临一些障碍。对澳美同盟来说,潜在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国。^④ 2012年,罗伯特·奥尼尔也再度将“同盟安全的困境”问题提出来。奥尼尔认为澳美同盟中存在双重的恐惧:既怕被抛弃又怕被捆绑。同盟的责任分担、中国与遏制战略的风险、可信度与延伸核威慑等问题,都对同盟构成挑战。澳大利亚应该更积极主动,推动与美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⑤

澳大利亚也认真探讨过“没有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201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提出,在亚洲的权势斗争中,美国将输中国将赢,但澳大利亚没能抓住这个变化。2019年,休·怀特在《如何保卫澳大利亚》一书中认为,澳大利亚将生活在一个美国缺席的亚洲,澳大利亚应追求“战略自主”,大规模提高澳大利亚国防实力,致力于在没有美国同盟的情况下保卫自己。^⑥ 怀特的观点引起澳大利亚战略界的激烈辩论,被视为对澳大利

① Coral Bell, *Dependent Ally: A Study of 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ince the Fall of Singapo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② William T. Tow, "Coral Bell's Alliance Politics: Practitioner and Pundit," in Desmond Ball and Sheryn Lee, eds.,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says in Honor of Coral Bell*, ANU Press, 2014, pp. 105-118.

③ Coral Bell, "Living with Giants: Finding Australia's Place in a More Complex World," *Strategy Report*,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Canberra, April 2005, p. 14, <https://www.aspi.org.au/report/living-giants-finding-australias-place-more-complex-world>, 2024-03-30.

④ Paul Dibb, *U. S. 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 an Australian View*, The U. S.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2005.

⑤ Andrew O'Neill,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Addressing Strategic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Sydney University, 2012, <https://united-states-studies-centre.s3.amazonaws.com/attache/3b/6a/99/95/cf/df/46/d2/5e/11/30/da/fc/5c/48/ec/alliance-21-report-united-states-oneill.pdf>, 2023-11-30.

⑥ Hugh White, *How to Defend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Press, 2019.

亚长久的战略思想和同盟战略提出了“激进”建议。^①

(三) 国家安全研究议题的拓展

什么威胁算国家安全威胁,什么问题可被列入国家安全研究范畴,这一问题在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议程中也一直在变化中。194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末期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澳大利亚也给予核时代的战略和核武器使用相当多的关注。^②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苏缓和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使国家间冲突的前景变得遥远,于是从经济维度思考国家安全在澳大利亚开始流行起来。到1980年,美苏关系再度紧张使研究主题再次回到军事研究和战略研究等传统安全主题上。相应地,以同盟为中心的战略研究或者说受国际大格局影响的澳大利亚安全研究主题开始消退,转而向以澳大利亚安全为中心的研究过渡。

2012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伦丹·泰勒(Brendan Taylor)提出,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应该超越军事研究和战略研究,应建立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安全研究。泰勒认为,国家安全理念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对武力与政策间关系的兴趣,以及对于如何协调军事、外交和工业的兴趣。同时,对安全困境的觉察也推动战后人们对制定更审慎的国家安全政策感兴趣。学界也投入精力研究如何在更高的军事安全与更好的经济福利、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点。”^③泰勒讨论了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独到之处,一是澳大利亚安全研究对维持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平衡的关切;二是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泰勒强调在安全议题的选择上,澳大利亚不应仅仅关注大国关注的安全议题。澳大利亚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应该与本国特点相一致。一些对于大国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重大安全问

^① Sam Roggeveen, “Book Review: Hugh White’s How to Defend Australia,” *The Interpreter*, Low Institute,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book-review-hugh-white-s-how-defend-australia>, 2023-12-01; Marianne Hanson, “How to Really Talk About Defending Australia,” *Australian Outlook*,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 30, 2019,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how-to-really-defend-australia>, 2023-12-01; Michael Shoebridge, “Hugh White’s Plan for Defending Australia Simply Isn’t Viable,” *The Strategist*, ASPI, Jul. 4,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hugh-whites-plan-for-defending-australia-simply-isnt-viable/>, 2023-12-01.

^② Brendan Taylor,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No 3, April 2012, https://nsc.crawford.anu.edu.au/files/uploads/nsc_crawford_anu_edu_au/2017-05/occasional-3-taylor.pdf, 2023-12-23.

^③ Ibid.

题。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学者就将环境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可能导致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2002年的巴厘岛爆炸事件后,澳大利亚人把恐怖主义视为安全威胁。气候变化、疾病、自然灾害等也渐被认可为国家安全问题。^①

以上对于国家安全内容的重新定义带来了争论。保罗·狄普认为,如果所有的国际焦虑/忧虑都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那么,涉及生死存亡的那些国家安全问题会被冲淡,比如国际权力转换。但是,狄普也不得不同意,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传统战略研究或者安全研究面临着如何回应新兴的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和气候变化的挑战。这三个问题都是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狄普忧虑,研究恐怖主义需要具备传统的、基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战略研究所没有的智识和方法,需要关于伊斯兰、中东历史及恐怖分子的背景和动机的知识。网络安全研究更是需要十分专业的知识,这是当前学术界所不拥有的。无论公私部门都面临着来自外国政府和个人的网上黑客行动,“这些智识和技术能力与传统学术训练十分不同”。^②

狄普拓展了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国家安全研究的议题。他认为,冷战结束和冷战结束的方式使以核武器、核战略、军事战略为中心议题的战略研究面临剧烈变化,是时候更多关注西方国家内部的排外情绪、被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破坏的民主、中俄内部不断上升的反西方民族主义情绪等国家安全问题。同时,澳大利亚学界也普遍认识到澳大利亚新的国家安全研究议程应该充分考虑如下议题:中俄使用武力和强制措施对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等等。而与此同时,狄普警告说澳大利亚知识界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因为知识界在知识上没有为这些新的国家安全问题做好准备。

在狄普影响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Centre, SDSC)的研究主题相应做出调整,对人口流动、环境问题、新军事革命、地区防务决策、美日关系、印尼国防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防政

^① Brendan Taylor,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ccasional Paper No 3, April 2012, https://nsc.crawford.anu.edu.au/files/uploads/nsc_crawford_anu_edu_au/2017-05/occasional-3-taylor.pdf, 2023-12-23.

^② Paul Dibb, “Conclusion: What Is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in Russell W. Glenn, ed., *New Direction in Strategic Thinking 2.0*, ANU Press, 2018.

策、朝鲜的动向、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问题都展开了研究。^①其中,气候变化受到特别重视。2016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和2023年的《国防评估》都将气候变化列为威胁的一个来源。

二、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视角转换

以狄普和泰勒为代表的研究思路,仍然是澳大利亚传统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向新领域的延伸。这些研究只是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分类的扩展,并不涉及研究视角的转换。近年来,在传统视角外,澳大利亚出现了新的审视国家安全的视角,如将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整合起来的路径、女权主义视角的国家安全研究路径等。

(一) 从“人的安全”视角审视国家安全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出现了一些对传统的国家安全研究的反思和批评。2005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马特·麦克唐纳(Matt McDonald)指出,现代澳大利亚政府试图推销一种“国家主义的、排他性的和军事化的关于安全的话语”。麦克唐纳批评说,澳大利亚政府在应对2001年以来的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战争时的国家安全思路过于以国家为中心,忽略了人的安全。他提倡澳大利亚应该在国家安全的规范问题上采取一种进步主义的路径。^②2007年,陆军退役少将米歇尔·史密斯(Michael G. Smith)和亚克利娜·惠兰(Jacqueline Whelan)发文提出“人的安全”。他们认为,虽然“人的安全”是个有争议的战略概念,但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共识正在形成,即人的安全提供了用整体主义方式兼容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道路。人的安全侧重对人的保护和赋权。对外实施“保护的责任”,强调通过国际法来实现安全,而不是过于依赖通过武力途径来实现国家安全。人的安全承诺将强化治理—安全—发展轴心,治理是通过法治保障社会安全,安全是保护个人与社

^① Paul Dobb, "SDSC in the Nineties: A Difficult Transition," in Meredith Thatcher and Desmond Ball, eds., *A National Asset: Essays Commemo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6, pp. 101-120.

^② Matt McDonald, "Constructing Insecurity: Australian Security Discourse and Policy Post-20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05, pp. 297-320.

区,发展是共同体的可持续的福祉。他呼吁采用更为整体主义的安全观念,将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整合起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具体在政策实践上,他们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在“人的安全”的指引下,采取预防性外交和灾难管理外交。^①

(二) 从女权主义视角审视国家安全

女权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它主张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追求国际和平,实现国家安全。随着女性在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崛起,是否有足够的女性参与和领导国家安全研究与政策制定,以及是否从女性视角来理解国家安全,决定着考虑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和最终政策。根本上,女权主义国家安全研究是要求在国家安全研究和政策领域实现视角转换。新南威尔士大学“未来作战中的女性”倡议项目联合发起人林赛·弗里曼(Lyndsay Freeman)认为应该改变国家安全观,改变判断国家安全威胁的依据。她认为,国家更应该投资和平的冲突预防战略,而不是战争。林赛·弗里曼认为,加强澳大利亚的外交需要采用以人为中心的安全和女权主义外交路径的交叉道路,这条交叉道路可以突破男性化的体系和结构限制。^② 昆士兰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尼可拉·乔治(Nicole George)批评澳大利亚政府参与的国际和平协议和倡议,认为这些协议和倡议由于缺乏女性视角和女性参与而导致失败。^③ 迪肯大学战略研究讲师夏农·齐默尔曼(Shannon Zimmerman)指出应该具有女权主义的国家安全视角。她认为女权主义国家安全研究反对“以追求国家的权利、父权制规则为基础的、国家化的、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安全”,赞成对安全的更广阔的理解;在追求国家安全的道路上,应该反对由现实主义强调的硬权力,拥抱更包容、更合作的国家间关系。^④

^① Michael G. Smith, Jacqueline Whelan, “Advancing Human Security: New Strategic Thinking for Australia,” *Security Challenges*, Vol.4, No.2, 2008, pp. 1-22.

^② Lyndsay Freeman, “Key to Australia’s Strategic Resilience: An Australian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Resilience, August 7, 2021, <https://www.nisr.org.au/article/the-key-to-australias-strategic-resilience-an-australian-feminist-foreign-policy>, 2023-05-06.

^③ Nicole George, “Gender, Security and Australia’s 2018 Pacific Pivot: Stalled Impetus and Shallow Roo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3, No.3, 2019, pp. 213-218.

^④ Shannon Zimmerman, “The Value of 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me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IS)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20, <https://www.wiisglobal.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WIIS-Policy-Brief-Feminist-Foreign-Policy-February-2020.pdf>, 2023-05-06.

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从业者的性别归属上,国家安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武装力量部门,无论在公共政策领域,还是在私人部门都是如此。在学术界,国家安全课程大多数由男性教师讲授,阅读书目也几乎都是男性作者撰写。安全和战略研究从业者中女性占比极低。在关键岗位上的女性太少,导致在关键的安全政策形成过程中几乎是看不见女性。这种性别分布状况导致在何为安全、如何取得安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笼罩着强烈的男性视角。至2019年,澳大利亚发布的33部白皮书、政策评估报告和其他重大外交、安全政策文件,无一是在女性领导下完成的。夏农·齐默尔曼认为,《2017年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对国际环境的描述显示它仍然是零和思维的,要与其他国家在“争夺性的”“不确定的”和“危险的”政策环境中活动。这种竞争思想自然会强调用军事方法解决相互冲突的政治矛盾,导致形成轻视外交、援助和减贫等女权主义青睐的方法和话语体系。夏农批评说在这份白皮书中,使用“国家安全”的频率三倍于“外交政策”。这导致决策者难以制定一项更关注可持续、伦理与正义的政策。在他们眼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国际关系被简化成要么合作要么敌对的简单二元世界。^①

目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的女性安全研究者正在探索国际安全领域与性别相关的各种前提假设与面临的挑战。该中心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性别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国际安全中的女性:理论与实践”(2018—2019)系列活动。2022年由个人与24家组织联合发起成立的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联盟呼吁在外交、国防、安全、女性权利、国际发展和其它领域中采取女权主义国家政策,打破澳大利亚外交把性别平等当作次要问题的传统,最终通过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包括父权制、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等,缔造一个人人自由发展的和平世界。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联盟倡议“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将把性别平等作为澳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应嵌入国家采取的方式和世界观中。它应该在政府各个部门中被制度化,并应接受女性权益组织、澳大利亚第一民族(即 Australian First Nations,指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

^① Shannon Zimmeerman, “Australia Needs 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The Interpreter*,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australia-needs-feminist-foreign-policy>, 2023-05-06.

斯岛民)、^①太平洋与亚洲人民的信息汇集并接受她们监督”。^②

三、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机构和人物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研究者群体,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相关机构也处在蓬勃发展之中。

除成立于1933年的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和1968年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外,今天活跃的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相关研究机构都是2001年后才成立的。老一代的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者有两个特点。一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个新国家,他们或者出生在澳大利亚之外,主要是英国;或者既在澳大利亚受高等教育,又在英国受高等教育;或者在澳大利亚政府部门或学术机构任职,或者在英国学术机构任职。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研究主题都有鲜明的跨国特色。第二个特点是由于数量稀少(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的总人口也只有2600万人),他们在政界与学界之间的“旋转”比较多,这从前述各位研究者的简介中可以看出。新一代研究者以在澳大利亚出生成长的人为多,他们与美国学术界和亚洲学术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且随着国家安全研究机构的增多,研究职位也大为增加,研究者的数量随之上升,研究主题更趋丰富,专业区分也更细致。专业化趋势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学界与政界之间的“旋转”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趋势对于未来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安全研究机构是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它成立于1924年,当时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的澳大利亚分支。1933年,该研究所更名为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该机构为独立非营利机构,宗旨是促进澳大利亚人了解、理解和加强与国际事务的

^① Australian First Nations, 指的是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澳大利亚,一直存在着推动承认这两个民族为先于殖民者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居民的运动。许多人认为仅仅用“土著居民”这样的词还不够,需要强调这些居民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居民。该运动是澳大利亚反殖民叙事的一部分,即该国的历史不应仅是讲述殖民者如何定居建国的历史。这一理念已经被澳大利亚社会接受。澳大利亚政府各部门也在这一理念推动下调整其各项政策。比如,增加土著居民担任外交官,以在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中反映土著人的利益和观点,增强澳大利亚外交使团的代表性。它是对于不同国民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不同认识这一事实的承认,正如承认女权主义视角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不同于男权主义视角的认识一样。

^② Australian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Coalition, “Advancing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Australia,” <https://iwda.org.au/australian-feminist-foreign-policy-coalition/>, 2023-05-06.

关系;强调政治中立和公开辩论。该所出版物《澳大利亚国际事务》(*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表关于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事务的高质量学术论文,特别关注亚太地区。该所每五年出版一本《世界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World*),评估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该所还不定期出版《澳大利亚展望》(*Australian Outlook*)刊物(线上出版物),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进行简要综述。

同样久负盛名、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机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目前有三个学院从事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1968年成立的“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SDSC)是澳大利亚安全研究的重镇,领衔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的著名人物几乎都与该中心有深厚联系,包括澳大利亚战略界的开拓性人物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托马斯·米勒和赫德利·布尔等。“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在塑造澳大利亚的安全观和安全目标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2010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内新成立了国家安全学院(The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和对公务人员的培训。洛伊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的创始人罗利·麦得卡尔夫(Rory Medcalf)2015年1月以来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院长。在其带领下,国家安全学院成为在学术界和政府间架起桥梁的机构,促进了国家安全研究的综合性和整体性。201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又成立了太平洋安全学院(Australia Pacific Security College)。该学院的建立是为了实施太平洋岛国论坛2018年通过的《波伊宣言》(*Boe Declaration*),促进地区安全,推进安全议程扩容,关注气候、环境、人的安全,以及传统安全。^①它由澳大利亚外交通商部资助,为太平洋安全官员提供职业发展课程,包括《国家安全政策》《战略评估和分析技能》《性别、和平与安全》和《新兴太平洋安全问题》等。该学院的目标是协助太平洋岛国制订和实施国家安全政策、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对话。^②

在2000年之后成立的研究机构中,目前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有20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和2003年成立的洛伊研究所(LOWY)。澳大利亚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从实务角度研究国防政策,从一个国防机构的角度给政府提供专业建议和政策

①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New Security College to Focus on the Pacific,” Nov.13, 2019, <https://www.anu.edu.au/news/all-news/new-security-college-to-focus-on-the-pacific>, 2023-05-02.

② 转引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安全学院官方网站:<https://pacificsecurity.net/#>, 2024-04-04。

选项。它自我定位为独立、非党派智库,但其接受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有时还有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该所认为,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它都是战略政策领域权威的声音之一,且论点已经在公共讨论中被广泛引用。澳大利亚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拥有出版物《战略家》(*The Strategist*),提供评论与分析,宗旨是为澳大利亚国防和战略政策选择提供批判性观点,并鼓励在战略研究界和公众中展开讨论和辩论。^① 洛伊研究所定位为“具有全球视野的澳大利亚智库”。其研究范围广泛,自称“我们的研究兴趣就像澳大利亚的利益一样宽广”,但作为一家澳大利亚智库,该研究所特别关注亚太地区。目前,洛伊研究所已发展成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辩论的中心。其年度演讲是其标志性事件,每年会请一位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就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世界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做演讲。自从成立以来,每一任澳大利亚首相和外交部长都在该研究所发表过演讲。每年洛伊研究所还会发布被广泛引用的澳大利亚公共舆论调查报告、“全球外交指数”(The Global Diplomacy Index)、“亚洲权力指数”(The Asia Power Index),以及“太平洋援助地图”(The Pacific Aid Map)等。其旗舰出版物《洛伊研究所出版》(*Lowy Institute Papers*)在澳大利亚国家议程设置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洛伊研究所的电子出版物《解读者》(*The Interpreter*)是外交政策智库中该类出版物的先锋。

其他澳大利亚大学也有与国家安全研究相关的研究与教学部门,如2006年成立的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该中心主要分析澳大利亚、亚太和世界安全问题。在该中心设立了“迈克尔·辛策(Michael Hintze)国际安全讲席”,以进行创新性研究和展开关于安全的教育项目。该中心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性别安全、地缘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地区安全,该中心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重视与政策界、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互动。^② 另外一些研究机构也从事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例如,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位于西澳大利亚珀斯的美国研究中心、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以及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等等。

^① 转引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官方网站:<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bout-the-strategist/>, 2024-04-04。

^② 转引自悉尼大学官方网站:<https://www.sydney.edu.au/arts/our-research/centres-institutes-and-groups/centre-for-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html>, 2024-04-04。

结 语

与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研究始终受制于国际局势的变迁。但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和立国历史仍然使得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有诸多与众不同之处。基于自身即是一个大陆的客观情况,澳大利亚将自己视为“孤悬”于亚洲的“西方文明的前哨”,这一认知可谓根深蒂固。澳大利亚在国际关系中的这个“元条件”造就了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其安全感的极度缺失,另一方面又认为享受着难得的安全,这种矛盾心态变成影响澳大利亚安全研究的“无形之手”,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或隐或显都受到这只“无形之手”的制约。在它感觉“不安全”的一面,它非常关注“我是谁”,关注与大国的盟友关系;在它感觉“安全”的一面,它对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度比较高,如环境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国家安全的新视角在澳大利亚发展得较好,比如从“人的安全”视角研究国家安全,从女权主义视角研究国家安全等。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在这一领域与加拿大、瑞典、挪威等中等国家的发展趋势比较一致,也是它与美国、中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大国的国家安全研究不太一样的地方。

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使人们看到国家安全的多样性和国家安全研究的多样性。澳大利亚研究者通过对其国家身份、同盟问题和澳大利亚特色安全主题的持久关注,在各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展示了它独具一格的特色。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研究既遵从和回应大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框架和主题,也一直试图开辟中等国家安全研究的新路径,强调在大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的环境安全、性别视角的国家安全等等。在未来,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研究仍将在这两个层面持续展开,既受制于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进展,又将持续努力为思考和研究国家安全提供新的主题和新的视角。